

关于反击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斗争
學習資料

第二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報”社論 (1)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	“人民日報”社論 (9)
反右派鬥爭是對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	“人民日報”社論 (15)
事實粉碎了謊言·····	“人民日報”社論 (19)

——讀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

反右派鬥爭的偉大意義 ·····	彭 真 (23)
------------------	------------

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和民主好·····	“河南日報”社論 (30)
--------------------	-----------------

把反右派鬥爭深入一步·····	“河南日報”社論 (34)
-----------------	-----------------

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	“河南日報”社論 (38)
----------------	-----------------

對團內右派分子決不寬容姑息，為保衛共青團的純潔而

鬥爭! ·····	“中國青年報”社論 (43)
-----------	------------------

反右派不能溫情主義 ·····	“南京新華日報”社論 (48)
-----------------	-------------------

胆敢翻案! ·····	“南方日報”社論 (51)
-------------	-----------------

——兼論農村里的牛鬼蛇神

誰說災區人民苦得不得了? ·····	吳芝圃 (56)
--------------------	------------

河南省肅反運動的勝利·····	賈心齋 (63)
-----------------	------------

誰說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周靜宇 (67)
-------------------	------------

絕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	胡 繩 (74)
---------------------	------------

社會主義制度和等級制度·····	叶鑊生 (83)
------------------	------------

略論立場和客觀真理·····	林可濟 (89)
----------------	------------

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	汪子嵩 (96)
----------------	------------

談談友誼和階級性·····	關 鋒 (101)
---------------	-------------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報”社論

現在我們都公認毛主席這樣的論斷是正確的：在我們國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不多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它從一個重要的方面表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摧毀反革命勢力的歷史任務，走上了鞏固發展的階段。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過去幾年來的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這本來是很容易了解的事。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那些企圖用庇護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謂平反委員會來取得政治資本的英雄們，却竭力散布種種謬論，特別攻擊1955年開始的在機關學校進行的肅反運動，說它“糟糕透頂”，根本沒有成績可言。另外一些人，或者由於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過，或者由於把暫時的局部的現象當作全體，也隨聲加以附和。為了澄清這些錯誤意見，對於肅反運動（主要是1955年的肅反運動）究竟有無成績，成績大小，必須根據事實，加以實事求是的討論。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一場艱苦的、複雜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敵人是隱蔽的。正因為這樣，我國人民在肅反鬥爭中，不但依靠專門的國家機關——公安部門——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廣大羣眾的積極參加。我們認為，只有廣大羣眾積極投入這個鬥爭，才能比較容易發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較少犯錯誤。要錯誤少就得經驗多，而經驗是需要積累的。

从这个观点出發，才能正确地估計1955年肅反运动的成績和錯誤。

1955年肅反运动的成績，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現在已經定案的來說，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國家采取了更加寬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沒有計算在內）。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蔣特务机关派遣進來的特务間諜，有老早就潛伏下來的特务間諜，有重要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把他們清查出來，对于我國的國防和建設的安全，無疑有極大的意义。

第二，由于肅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內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來，全國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長期潛伏的和美蔣派來的特务間諜分子。1956年全國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減少了40%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減少很多。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順利進展。

第三，在肅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問題，例如隱瞞参加反动組織、隱瞞反动身份、隱瞞歷史上的惡迹等等的問題。不弄清楚这些問題，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們自己也將背着沉重的包袱。現在，對他們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結論，使他們去掉了精神負担，便于積極工作。这無論对于人民事業或者對於他們本人，都是有利的。

第四，經過肅反运动，羣众比較懂得了怎样去識別隱蔽的敌人。使廣大羣众具有对隱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識別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僅过去和現在需要，將來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國主义还存在，蔣介石集团和殘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大家都看到6月9日报紙上的一条消息：6月7日晚上，一个特

务分子在廣州文化公園扔了定时炸彈。如果不是被兩位青年学徒發覺，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很明顯，羣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經過肅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以上所說的肅反运动的巨大成績，都是不容抹煞的。

否認肅反运动有成績的有几种人。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場上，从根本上否定肅反运动。人民認為肅反很必要，他們却認為肅反本身就是錯誤。人民因为肅反的結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謝共產党和人民政府；他們則因为自己的階級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觉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肅反运动和肅反运动中的積極分子，对于領導肅反运动的共產党和人民政府心怀怨恨。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黃紹竑，在解放以前本來是殺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劊子手。这样的人，对于肅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另一种人承認肅反运动有成績，却認為成績太小了。他們說，“搞來搞去沒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看來，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題大作”。

这种意見是錯誤的。首先，就是不說肅反运动給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說由于肅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單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們兴师动众去肅清么？

其次，應該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間，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門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經是內务部戶政司司長的周維斌，原來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長而且負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員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統特务分子。他曾經破坏內蒙古东勝

旗革命运动，出賣党的負責人，致王若飛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又如吉林省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处长于民一，原來是1938年混入革命隊伍的中統特务。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处長張榮桂，竟是一个混入共產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1935年他就参加了國民黨反革命組織C.C.。

讓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敌人在我們的革命堡壘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彈”。这些炸彈一旦爆炸，就可能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事業造成难以逆料的損失。

还应该指出：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現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而且这里面还有相当数目的重要的特务間諜。

廣州市第十五中学教員黃然，1955年3月經澳門的特务分子張維安、張維柱介紹，参加了蔣帮特务組織，被委任为“廣州工作組組長”。他曾八次用密寫、暗語等方法同特务組織联系和寄送情报。武漢市劳动局調配处會計王鵬，是蔣帮保密局的上尉通訊員，解放前干过逮捕進步学生、監視中共代表团等罪惡勾当。1949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員訓練班”受訓，1950年就潛回大陸進行特务活动，向敌人送过密寫情报多次，并陰謀架設电台。山西太原机車車輛修理厂四級工程師王孚中，騙取了先進工作者称号，審查結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長田峻之命，携帶电台一部，潛伏下來進行特务活动的軍統特务。

有人說，在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間，大部分并非身居要职，也不是現行犯。但是第一，对于重要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不能簡單地拿数字去判断；第二，沒有身居要职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对于人民的危害性也决不允許忽視。

許多人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河北灤縣“千人坑”大慘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愛國同胞在這個慘案中遭到活埋。當時河北灤縣日偽警察所警務股書記張占鰲，就是這次慘案的兇手。在埋人坑前面，曾經有一位婦女攙着一個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饒。毫無人性的張占鰲竟一木棒把這位婦女打到坑里，然後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後，他改名換姓，混進了黑龍江省龍江縣的教育界，當了小學教員。

1947年蔣軍侵入山東省昌邑縣的時候，該縣角蘭鄉自衛團長畢音祥，同一幫匪徒活埋和慘殺了本鄉的十五名革命幹部、積極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其中五個人是畢音祥直接動手殺害的。這個劊子手還慘殺了土改積極分子李永勝的全家，包括一個三歲的孩子。直到這次肅反運動，才把他從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雜工中清查出來。

像這樣萬惡的凶犯，能夠聽任他們逍遙法外嗎？

這樣的劊子手，隱瞞了自己的血腥的歷史，甚至改了名，換了姓，混在人民內部，雖然暫時同反革命組織中斷了聯繫，暫時隱蔽不動，但是有什麼根據相信他們已經痛改前非，真正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呢？一旦他們認為時機到來，他們就會重新擦亮屠刀來對付人民。6月25日報載，山東館陶縣浮渡鄉鄉長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慘遭反革命分子殺害。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敵偽時期當過偽軍班長，對革命羣眾有過血債。這一次他只是懷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細，就對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對於這樣的豺狼，難道不應該在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重新動手以前，就把他們清查出來么？

徹底肅清反革命，這是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正因為這次肅反運動在歷次的革命羣眾運動的基礎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勝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許多人的政治

問題，我們的革命隊伍更加純潔了，所以黨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這樣的論斷：反革命還有，但已經不多了。

再還有一種人說，肅反成績的確很大，但是錯誤缺點更大，因而得不償失。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當然，我們說肅反運動有巨大的成績，並不是說在肅反運動中沒有錯誤，沒有偏差。肅反運動確實有錯誤，在極少數單位，錯誤還很嚴重。無論錯誤大小，有了錯誤就必須糾正，不能含糊。但是這些錯誤同上述的肅反運動的重大成績比較起來，只能說是次要的。

肅反運動中究竟有那些錯誤呢？

錯誤的性質有兩類。一類是有些單位在肅反運動中漏掉了一些本來可以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另一類是不少單位錯鬥了一些好人。這些單位曾經根據一些不確定的材料，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和仔細的分析，把本來沒有政治問題的好人錯認為坏人。還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過容易引起懷疑的差錯，肅反運動一來，這些單位的領導方面沒有冷靜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錯和反革命破壞，以致把這些人當作反革命分子鬥爭了。

究竟為什麼一些共產黨員會犯這種現在看起來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呢？這是因為，反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本來是一件難事。加以許多單位沒有用最嚴肅的態度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或者把坏人當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當作了坏人。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須繼續清查，不能因為肅反有了成績而懈怠疏忽。錯鬥了一些好人，傷了他們的感情，損害了他們的名譽，使其中一些人暫時地同黨和政府疏遠了，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某些環節暫時地受到了一定的損失，對於這種錯誤必須坦白承認，並且徹底糾正。

有一些沒有反革命活動、但是隱瞞了政治問題的人，在肅反運動中也曾被鬥爭過。因為隱瞞政治問題而引起懷疑。隱瞞者本人不能說沒有責任。經過清查，現在才可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他們並不是反革命分子。如前所說，弄清了他們的政治問題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當作反革命分子，却是錯了。

此外，在一個短的時間內，有些地方，在鬥爭方式上犯了錯誤，例如打人罵人等等。這些錯誤僅僅是發生在1955年肅反運動初期小組鬥爭的高潮當中，時間很短，一經發現，就採取了糾正的措施。

有些人不大喜歡“難免”論。當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錯誤而沒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難免”論來推卸責任的。但是像肅反這樣的鬥爭，你或者根本不進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來；或者認真地進行，那就確有一部分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所以黨和人民政府採取了各種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錯誤的發生和擴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補救的錯誤。這些措施確實避免了許多錯誤，但是仍然沒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錯誤。

就錯鬥了好人的問題說，無論是直接被錯鬥的人，或者是同他們親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參加了錯誤的鬥爭、感覺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觀、代打不平的人，對於這樣的錯誤都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公平的認識。錯誤都是不對的，不好的，不應該掩護和粉飾的；身受錯誤損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種種痛苦。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事情還有另一面。這種錯誤是為什麼發生的呢？是為了保存反動勢力？是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是明知其為錯誤而故意犯錯誤？不是的。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個別的假公濟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須懲處的例外）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們當時並不知道而且很難知道自己是犯

了錯誤。在最英明的統帥所指揮的完全正義的戰爭中，也無法保證被炮火攻擊的都是該受攻擊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時甚至自己方面的戰士，也會受到誤傷。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據這些無心的過失，去否定一場革命戰爭或者衛國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呢？我們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這些過失的將士看作冤仇呢？同樣，每一個能夠客觀地權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對於肅反鬥爭中的錯誤，以及其他革命的羣眾運動中的錯誤，也不難作出正確的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斷。

毫無疑問，在鬥爭中，同一些人傷了感情，發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甚至是難于彌補的副作用），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足夠的估計。我們認為，在一方面，暫時受傷害的人應該看到事情的本質和整體，不要怨恨不已，必報復而后甘心；在另一方面，在鬥爭中誤傷了好人的人，特別是各單位肅反鬥爭的領導人，必須向一切受了傷害的好人公開承認錯誤，進行賠禮道歉。當着原來參加鬥爭的羣眾恢復他們的名譽。這個工作許多地方已經進行過，已經取得了許多被錯鬥的人的諒解。有些地方善後工作做得不好，應該立即毫不躊躇地認真補課。即令有些人暫時還不諒解，我們相信，當他們徹底了解了肅反鬥爭的意義，看到了肅反鬥爭的某些錯誤確是難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錯誤的人對他們確是毫無私怨，而且在認識了錯誤以後堅決糾正錯誤，向他們誠懇地賠禮道歉，當眾恢復他們的名譽之後，他們終有一天是會完全諒解的。

說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國、全省、全市、全區來說的。至於某些單位，錯鬥了一些人，而並沒有搞出一個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沒有反革命分子，當然應當進行具體分析，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即使這樣的單位，也不能抹煞肅反的成績。把一個單位的全體人員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

楚，为什么不是成績呢？至于用这样的局部的情况去判断全体，那自然更不正确了。

無論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場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張肅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給肅反运动潑冷水，决不能給参加肅反运动的羣众、積極分子和干部潑冷水。人民事業的進步；人民民主專政的巩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羣众、積極分子和干部的任勞任怨、百折不撓的奋斗，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們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經驗，提高覺悟。羣众、積極分子和干部的革命積極性，这是一切財富中最寶貴的財富。對他們潑冷水，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潑冷水，对社会主义潑冷水。

反革命分子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还需要繼續警惕，繼續識別，繼續清除。“有反必肅，有錯必糾”，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針。为了貫徹执行这个方針，对于过去的肅反运动的成績和錯誤，作出透徹的分析和恰當的估計，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夠用事实來駁倒那些根本反对肅反运动的右派分子，才能夠用事实來回答那些对肅反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才有利于認真糾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也才有利于保护人民羣众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積極性。

（1957年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人民日報”社論

从整風运动开始以來，許多人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对于某些机关、学校、企業和团体的人事工作，提出了不

少的建議和批評。這些建議和批評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意見是正確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意見指出了某些部門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待遇上，在干部管理的方法方式和人事工作干部的人選上，在對待非黨干部的宗派主義傾向和遷就主義傾向上，確實有嚴重的缺點和急待解決的問題。對於這種意見應當認真地傾聽、研究和採納。這種意見將積極促進人事工作的改善。另一種情況，意見是錯誤的。這種意見否定了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原則和人事工作的成績。按照這種意見，似乎事情都搞糟了，似乎大多數負責干部特別是中下級干部都不稱職，似乎事情都壞在有了人事制度，都壞在重視了干部的政治情況，因而弄得“重德不重才”，沒有“任人唯才”，沒有“不拘一格用人才”。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意見，對於這種意見必須加以堅決的拒絕和駁斥。

黨和人民政府歷來的選擇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顧，或者說既重視政治情況，又重視業務能力。干部是要做工作的，當然應當注重業務能力。但是人不是機器。機器可以掌握在誰的手里就為誰服務，人的一舉一動都受着自己的思想所支配。在人類世界還存在着階級的時候，人的階級立場對於人的政治行為具有決定的作用。地主縱然文化很高，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可以無所不曉，但是決不能領導土地改革，也決不能領導農業合作社。同樣，資本家辦事無論如何有效率，決不能領導“三反”和“五反”，決不能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只有工人、勞動農民以及同工農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中的經過考驗的先進分子，才能組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骨干。只有在思想上擁護或者至少同情社會主義的人，才能忠實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因此，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工作，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務問題，而是關係國家命運、影響國家政權

性質的原則問題。在革命時期，這個問題尤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正是決定於什麼階級取得了和掌握了政權，什麼政治力量組成了政權。一切反對黨和人民政府的幹部政策的人，反對用人應當重視政治情況的人，恰恰忘記了或者故意“忘記”了這一點。

歷史上的任何國家政權都是以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力量為基礎組成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公開地指明這一點，而資本主義的國家却往往竭力把自己偽裝成為“全民”的國家。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無產階級變成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馬克思進一步指出：

“工人階級絕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必須用新的人、新的組織、新的方法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列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大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在他的領導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建立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也明白地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在這裡，沒有也不能有絲毫含糊的地方。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當然有責任按照工人階級的政治標準來挑選幹部，當然有責任使我們的國家機關的構成確實符合於憲法的規定，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曾經這樣來描寫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馬克思所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要歸結於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借羣眾武裝力量的政權。為要實現推倒資產階級，就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變為能夠鎮壓資產階級所必然進行的拚命反抗，並能夠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羣眾來建設新經濟制度的這樣的統治階級，才能夠做到。”當然，這裡所說的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不與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羣眾聯合，並不是說無產階級不需要在經濟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舊社會受教育的、但是願意同勞動人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的專家和技術人員，而是說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的領導。在我國，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參加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的，不僅有廣大的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而且有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家。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挑選干部的任务就顯得格外繁重而複雜。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為了保證無產階級對於整個國家政權的領導不受動搖，對於各種出身不同、經歷不同的干部的政治歷史、政治傾向和政治品質進行了解，根據干部的政治情況和業務能力作適當的安排，這種必要不是很清楚的嗎？如果不是這樣，如果照某些人所主張的那樣，不要人事制度，糊里糊塗地使用干部，以致把重要的職責委託給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別有用心的人，那麼，社會主義事業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人民民主的政權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這個道理不也是很清楚的嗎？

反對重視干部政治情況的人，常把所謂“德”說成一種抽象的東西，或者把它說得神秘莫測，或者把它說成是排斥異己的宗派主義的化身。這當然是一種歪曲。實際上，如前所說，

在我們的國家机关（更不必說經濟文化組織）中間，根据統一戰綫政策、对旧人員“包下來”的政策和对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容納了大量的在过去歷史上同革命絕少姻緣甚至是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会主义的國家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員，当然不能不提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要求。过去的歷史尽管千差万別，但是審查清楚是必要的；过去的政治主張尽管存而不論，但是在現在接受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必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八条規定：“一切國家机关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憲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規定的就是我們的國家要求于全体工作人員的起碼的“德”。國家在选拔和考核工作人員的时候，固然必須嚴格遵守这个标准，而且在培养和教育工作人員的时候，也必須嚴格遵守这个标准。反对重視干部政治情况的人，也反对在学校中進行政治教育，反对在高等学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的时候注意政治条件。这本來没有什么可怪。可怪的是高等教育部的一些同志們在改進选派留学生办法的时候，似乎也認為“重政治、輕業務”的批評是正确的，似乎也認為选派留学生可以不問政治，“一視同仁”，（見5月29日本報第一版）。輕業務当然不对，但是重政治有什么不对呢？选派留学生，以至招收和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分配高等学校的畢業生，同人民的事業都有重大的关系，怎么可以不重視政治呢？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权在选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具体内容，有拥护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區別罢了。真正不管干部的政治情况的國家，在世界上是沒有的。那些向党 and 人民政府要求所謂任人唯才、要求用人不問政治情况的議論，如果不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由于在政治

上無知。

右派分子惡毒地攻击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部門，把它說成是“宗派的窩子”，說成是“閻王殿”。他們如此仇恨人事工作部門，可見人事工作在階級鬥爭中的地位是怎样重要了。誠然，人事工作部門的一部分工作人員还缺少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他們的工作的方法方式必須有許多重要的改進，他們在干部的選擇和提升方面也犯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必須加以切實的糾正。但是，从总的方面說來，人事工作部門所執行的路綫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們在建國八年來的繁重的工作是有巨大成就的，这是不能推翻的事實。党和人民政府提拔了大批的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小知識分子”、“穿破鞋的”、种种在旧社会被侮辱和損害的优秀人物到我國的政治舞台上來，到各个战綫的重要崗位上來，讓他們成为我們國家的脊骨，这难道做錯了嗎？如果不是依靠他們的埋頭苦干，依靠他們同廣大人民羣眾的密切聯系，難道我們的國家能夠这样徹底地完成民主改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并且这样順利地進行社会主义革命嗎？如果不是依靠他們同人民羣眾一道不屈不撓地努力，難道我們的國家能夠这样有效地戰勝各方面的嚴重困難，我們的建設事業能夠这样地突飛猛進嗎？旧时代官僚机关里尽管充滿了“才俊之士”，却从來不能脫离假公濟私、任用私人、貪污詐騙、壓迫羣眾等等丑惡現象，这种現象在我們的國家机关中不是基本上消滅了嗎？我們已經組成了新型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國家机关，这个基本事實就証明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当然，應該指出，我國建設事業的一切成就，包含各方面的技術專家的劳动成果在內，包含从旧社会來而真正效忠于新社会的公務人員的劳动成果在內。但是他們都獲得了为祖國服务的機會，这个事實不正是証

明了我們的人事工作部門並沒有排斥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實行“任人唯黨”的宗派主義路線嗎？

在我們的人事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傾向是有的，黨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之一，正是要同這種有害的、非工人階級的、非社會主義的傾向作鬥爭。但是反對宗派主義，決不是說用人可以不問政治。恰恰相反，在反對宗派主義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同黨內外的那種認為用人可以不問政治的傾向作鬥爭。只有這樣，才能貫徹德才兼顧的原則，才能在人事工作問題上達到整風運動的目的。取消效忠於人民羣眾、效忠於人民民主、效忠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勢必出現另一種只有利於少數人的政治標準。那不但是徹底的宗派主義的政治標準，而且根據歷史的客觀規律，那必然是一種反動的、反人民的、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

(1957年7月23日)

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 的重大考驗

“人民日報”社論

反右派鬥爭正在向全國各階層、各地方發展。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是不能鞏固的；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不能勝利，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涉及到全國每一個